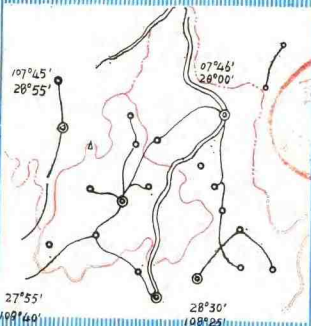


23

德江文史资料

第一辑



德江县文史资料

第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德江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一九八五年七月

前 言

编写文史资料，是敬爱的周总理生前提倡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一再指出：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是我国文化事业的组织部分，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再三敦促各级政协要搞好文史资料的编辑工作。要动员各方面人士把亲历、亲见、亲闻的“三亲”资料记录下来，以补书报、文献之不足，为史料的积累和研究开创了新的领域，丰富了统一战线工作的形式和内容。

一九八四年九月，德江县政协成立后，随即成立了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组织力量着手征集、整理、研究，编辑文史资料。在工作中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存真、求实”的方针，把具有学术性、资料性、知识性的稿件作为本辑内容，以它的各个片断、侧面，介绍德江的乡土历史。期能为历史研究和教学，为爱国统一战线、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

由于得到中共德江县委、县人大常委、县人民政府等领导同志的关怀和鼓励，得到县党史办、民委、档案局等单位的热心支持和协助，现已粗成第一辑。这仅是我县文史资料工作的起步。还希望县内各部门、各级领导和同志以及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提供资料，以便陆续编辑出版。

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建立时间短，人力有限，编辑知识和写作能力也有限，本辑资料难免有缺点和错误，恳切希望读者批评指正，以便改进工作。

本辑资料编写期间，适逢“遵义会议”与红军进驻德江县的枫香溪，开辟黔东根据地五十周年，故重点刊载《红军在德江》、《黔北特委在德江》等有关史料，以示缅怀，以资纪念。

最后，借此篇幅向支持本辑出版的领导和不辞辛苦，参加撰稿、改稿、校正史料的同志致衷心的感谢。

德江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七月

目 录

前言	(1)
周恩来同志在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纪要	(1)
高举爱国主义旗帜, 开创文史资料工作新局面	(6)
德江县沿革沿革初考	(21)
附图: (1) 德江县(旧安化县)疆域沿革图 (2) 德江县略图(现有疆域)	
移建安化县碑记	(30)
红军在德江	(31)
插图: (1) 枫香溪会议地址(照片) (2) 红军委任状(照片)	
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枫香溪会议纪念碑碑文	(60)
附图: 枫香溪会议纪念碑(照片)	
德江“神兵”始末初考	(61)
苏区保卫队长王邦俊	(69)
黔北特委在德江	(72)
插图: (1) 中共黔北特委负责人张立与宋 至平同志合影(照片) (2) 黔北特委绘制的供地下工作人 员使用的路线图(照片)	
黔北特委旧址碑文	(105)
附图: 纪念碑(照片)	

中国人民解放军黔东北纵队给贵州省委的报告 (影印原件)	(107)
中共贵州省委关于整编黔东北纵队及干部调配 的决定	(120)
中共贵州省委组织部给先仲虞、刘学礼、 董哨媚、朱亚四同志的信(影印原件)	(121)
先仲齐先生解放前后二、三事	(125)
一九四九年我组织维持会的经过	(130)
奇袭洞佛寺、活捉普广爱	(136)
洞佛寺革命战斗遗址碑文	(142)
回忆德江执行谷正伦应变计划情况	(144)
忆一九五〇年的德江	(149)
元、明、清、民国时期历任县官考略	(154)
国民党御用工具——县参议会	(172)
征稿	(179)
德江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成员名单	(181)
德江县文史资料第一辑编辑人员名单	(182)

周恩来同志在政协 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纪要 (记录稿)

一九六五年三月

今天开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常务委员会，大会选出常务委员会后，一直未开会。徐冰同志说，一定要等我抽出时间来主持，因此，迟到今天才开。因为一个人的关系，耽误两个多月。提议以后可请彭真副主席主持，他已答应了。如果彭真副主席没有时间，还有陈毅副主席嘛！总之，不能因一人而耽误会期。

搞文史资料，是我提议的。到现在已出了五十一期。开始大家感兴趣，后几期就不好了，质量低了。有的内容有问题，甚至低级趣味，黄色的东西也出来了。思想不革命化，机关不革命化。资产阶级思想，也反映到了文史资料上。

文史资料工作的方向要对，要存真，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并不容易。在政府工作中，我的经验是：往往一件事，某人来讲如何如何，可是另一人来讲又有出入，并不是那样。我有这样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实事求是并不容易。苏北有个启东县，那里不仅是棉花高产，粮食也高产。那里土地不多，一百多万亩，其中有一半种棉花。有一位同志到苏北

视察归来说，那里人民生活好，但没有牲口，因为地处黄海之滨，是水网地区，水位很高，不能用牲口深耕，靠人力耕。这个地方，人口很密，耕地少，劳动人民却能使它双丰收，粮食亩产一千斤，皮棉亩产一百多斤，值得称道。这么一个地方，用什么样的机耕设备帮助他们呢？考虑手扶拖拉机比较适合。最近启东县的秦素萍（女）副县长来谈，情况不然。她说，解放后已做了改革，搞了大块台田，深挖了沟渠，降低了地下水位到一米七八，已可以深耕七、八寸，因此同样可以用牛耕地。这几年已有了不少大牲口，深耕还是增产措施的一条，所以那个地方可以保证高产。你看，我听了两个提告，就不一样，秦素萍自己管这个事，应该是第一手材料实在。

所以，我们调查研究可要注意第一手材料。调查研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蹲点也不一定能取得第一手材料，不一定能抓到事实的本质，看你怎么蹲法，要走阶级路线，要走群众路线，同时要实事求是。比如：纺织工业，华东提出高转速，并不一定好，转动太快了，就会损伤设备，要大修。但是，对群众的意见，第一不能泼冷水，第二要实事求是。

文史资料也如此，不是任何稿子来了，不加分析，不加选择。当然，我也不主张大改。不合适的，可退回请他改写；事实有出入的，可请几位有关的人一起谈谈。如果坚持不改，就保存起来，不给他发表嘛！总之，要研究，要选择，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名称就有“研究”二字嘛！

文史资料要搞好，这对以后研究历史有帮助。不要哗众取宠，故作惊人之笔。最近好象好了一点，我看了一篇，就不错。讲的是袁世凯挟制熊希龄（字秉三）解散国民党的经过。熊希龄是袁世凯时代的所谓第一流人才，是内阁总理。

他在承德的避暑山庄（是清朝廷的行宫），盗了一些古物，送给了姜桂题，姜是袁世凯的人，向袁世凯密报了，袁世凯就派许世英暗查此事，许向袁作了报告，果有此事，就写了材料呈报袁世凯。有一天袁世凯约熊希龄到总统府，熊刚到，就有外交使节来见袁，这是事先安排好的，袁就先去会外宾，叫熊到他的办公室稍候。熊到袁办公室，空无一人，只见办公桌上放着调查避暑山庄窃宝案的报告，熊一看，面色苍白。袁世凯进来，看见熊的神态，故意表示关怀地问他：你的脸色为什么这么不好看呀！接着就讲国民党怎么不好，我的意见必须立即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的议员资格，你看怎么样？熊当时内心惶恐万分，只好听从袁的摆布。袁马上就把已经准备好的大总统命令取来，熊希龄即签了字。熊一签字，袁世凯就传令在邻室等候的阁员进来，在上面签名副署。这就是袁世凯挟制他的第一流人物内阁总理熊希龄的经过。这可以教育我们的青年认识中国的封建政治。从《东周列国志》、《春秋》、《左传》看起，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三千多年历史，无不如此。其实，现在西方的政治，现代修正主义的政治也无不如此。赫鲁晓夫搞斯大林，苏共新领导一夜之间搞掉了赫鲁晓夫，还不是宫廷政变？肯尼迪被暗杀，至今查不出来。把封建政治揭露出来，对教育青年有好处。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治不是这样，光明磊落，当面批评，治病救人。希望民革的同志把蒋介石的事情写出来，要把旧东西揭露出来。

现在不仅要写旧的政治，旧的文艺也要写。文化部正在对非无产阶级的文艺思想进行批判。事情要一分为二。如胡适是为反动派服务的家伙，但也有点贡献，白话文总与他有关系，这是一功。把他的白话文写出来，又把他的反动作官

路线写出来，表示我们公正，对旧知识分子也有帮助。五四时代，鲁迅议论过，搞白话文运动有三类人：一种是为往上爬，做官，如胡适之流。第二种是继续革命，如李大钊、陈独秀。以后他们又走了两条路，陈独秀也不革命了，他是思想反动，行为不革命，并没有帮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做坏事，这比汪精卫当汉奸要略胜一筹。对陈独秀也可以写点，反面人物有教育作用。第三种是退隐，如鲁迅自己。后来，他经过“三·一八”事件以后，才逐步认识了应走什么道路。在《二月》序言，他还在动摇、徘徊中。他在序言中说，看潮者分三类：第一类是弄潮儿，勇敢地在浪潮头上航行，勇敢地领导革命；第二类是在高山之上观潮；第三类是在走在沙滩上，生怕衣履被浪潮浸湿了。作者柔石是第三类，他自己是第二类，当然是属观潮的，还是《阿Q正传》的思想状况。他最后觉悟是靠两个方面：1.党内“左倾”分子大骂他，说鲁迅不懂马列主义，不懂无产阶级文学，逼得鲁迅读了马列主义；2.国民党的压迫，一九三一年大批文艺界同志的牺牲，教训了他要参加革命斗争。最后几年，鲁迅斗争很紧张，硬骨头，一直战斗到死。主席说他“晚节可贵”，对他评价很高。晚年失节，在封建社会都是不能原谅的。他是正面人物，还有这么许多曲折颠簸。

我们搜集文史资料，就是要我们的同辈把遭遇写出来。研究文史资料要有个方向，用历史知识教育启发后代。正面反面都要很好分析，不要以为出了选辑就完事。希望新的委员和办公室的同志有所改革，要对问题进行分析，争论一番，一分为二，对的，不对的，对后代有教育。不要只给老人放在床头，睡不着觉看看。我看许多人看这东西近于消遣，这不利。我总想从里面得到点东西，如熊希龄的事，我

看后就记得很清楚，用反面的政治史料提醒我们。文史资料对研究历史，教育青年有好处。总之希望你们革命化。现在出了五十一期，希望从五十二期起大有改革，以利后代。否则将作为废纸。两个前途：一为历史研究的材料，一为废纸。这是文史资料的两种前途，两种命运。因此事是我发起的，所以多说几句。

各工作组，希望多做些事。

高举爱国主义旗帜， 开创文史资料工作新局面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六次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自一九五九年周恩来同志倡导以来，已经二十四年。由于有关领导和各方面的重视，历届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和从事文史工作同志的努力，加上各界人士和有关单位的支持，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全国各级政协共征集到各类文史资料四亿多字，参加提供史料的有六万多人次，已有一百六十六个单位出版了文史资料选辑和其他专著，出版字数达一亿字左右。其中全国政协出版的有二千六百多万字，发行七百六十万册。出版物的种类有《文史资料选辑》、《革命史资料》、《文化史料》、《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纵横》、《文史集萃》、《辛亥革命回忆录》以及各种专题资料和专著。这些资料是当事人的亲身经历或亲闻亲见者的记述，它既弥补了历史文献之不足，为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文艺创作等部门提供了重要参考材料，为教育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提供了生动的教材，在继承和发展祖国文化遗产、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起了积极作用，受到社会有关方面及各界人士的重视和欢迎。特别是通过文史资料的征集和出版工作，使我们加强了同社会各界人士的联

系，促进了爱国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

一九七八年政协恢复工作以后，特别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同其他战线的工作一样，文史资料工作进入了新的蓬勃发展时期，呈现了新的面貌。主要表现在：随着全国拨乱反正工作的胜利开展，文史资料工作中存在的“左”的思想影响，也不断得到克服，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得到了进一步贯彻；一些地区，在广征博采的基础上，开始转入了有计划、有重点的征集，题材也从过去以军事、政治为主体逐渐向文教、科技、工商经济等方面发展，征集对象也随之扩大了；过去地方政协主要是征集史料，现在各省、市、自治区（还有一些州、盟、县）都出版了文史资料，并且互相协作，形成了全国性的文史资料工作网；我们的出版物发行范围扩大了，由过去仅供历史研究部门和领导干部参考，逐渐扩大到一般读者，有些省市已在国内外公开发行；文史工作队伍也有所扩大，补充了一些中青年干部。凡此种种，表明周恩来同志开创的文史资料工作无论在广度上、深度上都比过去大大向前推进了。现在随着全国工作重心的转移，两个文明建设的深入开展，爱国统一战线的扩大，对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种新的形势下，认真总结二十四年来特别是恢复工作以来的经验，是十分必要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发扬成绩，克服缺点，解决前进中的新问题，进一步开创文史资料工作的新局面。

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是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方向

胡耀邦同志在中共中央邀请各方面人士举行的民主协商会上，发出了“毋忘团结奋斗，致力振兴中华”的号召，这

个号召的核心是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和崇高美德，是推动祖国历史前进的一种巨大精神力量。它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可以促进各种不同出身、不同社会经历、不同职业、不同民族、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不同信仰的人团结起来，这也是我们实现祖国大团结大统一的思想基础。人民政协是个爱国统一战线组织，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是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方向。

一九五九年，周恩来同志在谈到文史资料工作的重大意义时，曾说过：“新的东西总是从旧根子上来的”，“暴露旧的东西使后人知道老根子，这样就不会把历史割断”。他还高瞻远瞩地指出：“研究文史资料要有个方向，用历史知识教育后代。”这里蕴含着深刻的爱国主义思想。对此，经过多年的实践，我们逐渐加深了认识。

人民政协征集和出版的数以亿计的文史资料，以翔实、具体、生动的史实，从各个侧面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实际，记录了戊戌以来我国社会的政治风云。通过这些史料，人们一方面可以看到在反动阶级和反动制度的统治下，我们可爱的祖国如何一步步地走向贫穷、落后的困境，连年内战和外敌的侵略，给人民带来了多少苦难；另一方面，更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人民是具有反侵略，反压迫，争民主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是勤劳勇敢、有智慧、有高度民族自尊心的。多少仁人志士为探求救国救民的道理而呕心沥血，奋斗终身；多少老一辈革命家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前仆后继，英勇奋战；多少爱国的思想家、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艺术家、实业家等在困难险恶的环境中，勤奋工作，为振兴中华作出了自己的光辉贡献。这些史

料，使人们深深感到创业维艰，今天来之不易，从而激发爱国热情，积极投身于四化建设、统一祖国、反对霸权主义的伟大斗争中来。

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特点是组织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撰写史料，这一工作本身既团结了各民族、各阶层、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还联系了一部分其他部门较少联系的社会人士，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各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同各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携手合作，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风雨同舟，结成盟友。发动各界人士撰写史料，既肯定了他们为民族解放和建立新中国而奋斗的历史业绩，也是统一战线工作活生生的历史实录。对撰写者和干部、群众都是一次具体、生动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再教育。对于国民党的起义、投诚和被俘人员来说，撰写史料也能促进他们总结自己的经历，进行两方面的对比，辨明历史是非，认清时代真理，为促进团结进步事业而努力。这些事实雄辩地表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方针，倡议国共第三次合作是真诚的。只要爱国，就可以团结起来。

多年的实践证明，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按照这个方向去开展文史资料工作，可以大大活跃人民政协的工作。这些年来，许多老人感到参加文史资料的撰写工作是为社会主义祖国作贡献的实际行动，是自己的历史责任，乐于把自己写的史料送给政协。一些侨居海外的辛亥革命烈士家属，得悉文史资料记载了他们先辈的历史，深受鼓舞，说“共产党没有忘记我们”。有的人专程从港、澳和海外回来向政府和撰写人表示谢意；有的人表示愿意为我们撰写史料，为祖国四化建设贡献力量。文史资料工作对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也起

了很大作用，我们发表了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人的史料后，在国内外反映都很强烈，他们的很多友好和学生反映说：“一篇传记温暖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这些生动的事例充分说明，文史资料工作在政协工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当前爱国统一战线更加扩大，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正在全国大规模兴起，并且将持久地进行下去。在这个新形势下，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应当更加突出自己的特点，发挥自己的优势，更高地举起爱国主义的旗帜，做好包括资料征集、整理研究、编辑出版在内的全部工作。在这方面，我们应当解放思想，扩大视野，开拓工作的新领域。

全国政协和各地政协拥有委员二十万人，加上民主党派成员以及他们所联系的人，是一支很大的队伍。他们掌握着许多的活史料。由于种种原因，有一些人过去提供的史料很少，或完全空白。这个缺陷应当加以弥补。特别是对于著名的知识界人士，应作为重点，深入发掘和整理发表他们的史料，以进一步调动他们的爱国主义的积极性。

我们祖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族人民都是统一大家庭中的成员。少数民族在祖国历史发展中作出过重要的贡献。在少数民族中也蕴藏着丰富的历史资料，应当组织力量，大力收集和发掘。

在海外华侨中有不少著名的爱国者，散居在港、澳和海外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和官员有不少人掌握着重要资料，随着海外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内外交往的频繁，我们应当通过各种渠道，积极而稳步地开拓海外征稿工作的新领域。配合主权的收回，对香港本身社会史料的收集也应当提到议事日程

上来。在国内公开发行的文史资料，可以有选择地在香港发行或出版，以扩大爱国主义宣传。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周恩来同志生前非常关心文史资料研究工作，他反复告诫我们，做文史资料工作要严肃认真，“要存真，要实事求是”。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二十多年来我们一直把周恩来同志的这一指示作为文史资料工作的根本方针来贯彻的。我们要求撰稿人可以不拘观点，不拘体裁，不拘长短，但必须忠于历史，秉笔直书，不为亲者讳，尊者讳，不溢美，不贬损。为了贯彻这个方针，各地采取了一些有效的做法。如在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下面设立政治、军事、经济、文教、科技、民族、宗教、华侨、社会等各个业务组，请经验丰富的老人参加业务组工作，对稿件进行审核；重要史料组织会议讨论，集体把关；疑难问题送请有关单位或有关人士帮助核实；对其说不一，一时难以判断的则多说并存，并在《文史资料选辑》上开辟“质疑、补充、订正”一栏，走群众路线核实资料。由于采取了这些作法，从总的说来，基本上保证了我们出版的资料的可靠性，史料价值是比较高的。有的资料被采入了专门史料汇编，有的为重要历史著作所引用，有的被学校列为参考材料和“乡土教材”，有的资料还匡正了某些文献的谬误，或填补了空白。

文史资料工作，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要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来叙述。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马克思对巴黎公社历史经验的总结，毛泽东同志对伟